

《汉书》断代为史说献疑

——以《古今人表》之撰作为例

刘 咏 聪

在中国史学史上，《汉书》一直被推为“断代史”之始祖，毁誉参半。然而论者每每不自觉地采用了后世日趋成熟的“断代史”观念，去批评作者班固撰《汉书》体例不纯，有失“断代史”之实。

《古今人表》之编纂，更是全书最受攻击的部分。笔者认为，《汉书》为中国“断代史”之祖这个说法，毋庸置疑，但一种观念由萌芽至成长，往往需时甚久，我们是否可以在未清楚作者有无明确的“断代为史”观念以前，便轻率地用后世的标准去批评他？这样做又是否公允？本文拟对这一延续十多个世纪的讨论，略抒一得之见。

《古今人表》之受人攻击，归纳起来，不外“画蛇添足”、“品第失当”以及“有乖义例”等三方面。

刘知几批评《古今人表》“不类本书”、“其言甚高，其义甚愜”；赵翼说它是“赘设”、“班书第一蛇足”；而类似“表其所不必表”、“最无谓”等之讥诮，亦纷为备至。在他们眼中，《古今人表》品列古人，任情轩輊，且非关汉事，实在有所不必。《古今人表》将历史人物由“上上”至“下下”评为九

等，“圣人”、“仁人”、“智人”分别入“上上”、“上中”、“上下”三等，而“愚人”则入“下下”等。后人讥评此表，辄攻其妄自品第，如吕祖谦即说作者“以区区一夫之见而欲定生民以来圣贤惠智之等差”，是“不知量”之举。陆奎勋《阅〈汉书〉作》亦说：“史才争数马迁优，细阅班《书》岂匹俦。《人表》朦胧分九等，《艺文》商榷待千秋”。^①可见《人表》之存在，不但本身受批评，兼且亦影响到后人对《汉书》之整体评价。

然而，最为人所议论者，莫过于《古今人表》直接有乖《汉书》义例一事。在这方面发挥得最详细而最具代表性的是刘知几，他一方面极力提倡断代史之撰作，称许《汉书》“究西都之首末，穷刘氏之废兴，包举一代，撰成一书”、“自尔迄今，无改斯道”^②；另方面却批评此表名不副实说：

班固撰《人表》，以古今为目。寻其所载也，皆自秦而往，非汉之事，古诚有之，今则安在？^③

此外，刘氏还认为《人表》不合《汉书》断限，是作者自乱其例之举，他说：

……异哉，班氏之《人表》也。区别九品，网罗千载，论世则异时，语姓则他族。自可方以类聚，物以群分，使善恶相从，先后为次，何籍而为表乎？且其书上自庖牺，下穷嬴氏，不言汉事，而编入《汉书》，鸠居鹊巢，葛施松上，附生疣赘，不知翦截，何断而为限乎？^④

又说：

夫子曰：“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。”若《汉书》之立表志，其殆侵官离局者乎？（浦释：提出《汉书》断限不清来。断代自班始，故首及之。）考其滥觞所出，起于司马氏。案马《记》以史制名，班《书》持汉标目。《史记》者，载数千年之事，无所不容；《汉书》者，纪十二帝之时，有限斯极。固既分迁之记，判其去取，纪传所存，唯留汉日；表志所录，

乃尽牺年，举一反三，岂宜若是？胶柱调瑟，不亦谬与⑤！换言之，刘知几主张断代史应严守断限，不能逾越，因此对《汉书》之表、志内容超越汉代颇有微辞，而尤其不满意未及汉人而名古今的《人表》。刘氏之后，类似的言论，此起彼落。然而，笔者认为，在处理有关评论时，应先辨别清楚的，是《汉书》作者到底有没有和后世“断代史”一致之观念。

必须指出，“通史”和“断代史”的概念，是后期才趋于成熟的，将《汉书》推为断代史之祖，也是史评既发达后学人之论定。班固本人对于“断限”的理解，与后世是否相同，是很值得怀疑的。再者，我们也没有理由以后世“断代史”的标准去批评他自乱其例，更没有理由要求一部所谓断代史之祖就是一部体例纯正，为后代垂立金科玉律的成功典范。这是处理《人表》的评价问题时必先注意的。其次，作者本人何以编撰《人表》，也必须认真了解。班固在《叙传》中解释作《人表》的原因说：

篇章博举，通于上下，略差名号，九品之叙。述《古今人表》第八。

虽论者有谓“通于上下”一句文义含糊，但王先谦称“上下谓古今”之说⑥，如果配合其他材料，也是可以接受的。班固又说：

固以为唐虞三代，《诗》、《书》所及，世有典籍，故虽尧舜之盛，必有典谟之篇，然后扬名于后世，冠德于百王，故曰“巍巍乎其有成功，焕焕乎其有文章也！”汉绍尧运，以建帝业，至于六世，史臣乃追述功德，私作《本纪》，编于百王之末，厕于秦、项之列。太初以后，缺而不录，故探纂前记，缀辑所闻，以述《汉书》，起元高祖（刘邦），终于孝平（刘衍）、王莽之诛，十有二世，二百三十年。综其行事，旁贯《五经》，上下洽通，为春秋考纪、表、志、传，凡百篇。

这是他对于《汉书》断限的直接交代，值得注意的是他虽然点明了《汉书》的起讫，却强调全书要“旁贯《五经》，上下洽通”。

颜师古注：“固所撰诸表序及志，经典之义在于是也。”与其说班固“以经学的观点去撰写史书”、“为《五经》作注脚”^①，不如直接指出，班固未尝不有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”的理想；他在《古今人表》的序文上也说：

“……因兹以列九等之序，究极经传，继世相次，总备古今之略要云”。

抑亦显示了他的“会通”思想。尤应留心的是，“通史”和“断代史”，本来就不是壁垒分明，互不相容的。“即使是断代为史，会通之义照样可以贯串在里面的。不一定上下古今，才能算是会通。”^②绵延千古的“班马优劣论”，其中一个焦点就在通史和断代史孰优孰劣上，但马、班是否有意为之？班固既欲“上下洽通”，而史迁亦“述陶唐以来，至于麟止，自黄帝始”、“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”，未尝不有意为断限。魏应麒的意见，很值得参考，他说：“平心论之，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体制相同，惟断限有异，此则时代使然，非关学力。《史记》之前无断代完备之史，故《史记》不能不上起于黄帝；《汉书》既有《史记》，自无妨就一代之始终而加以纂辑。二书皆负有时代之使命，有莫之为而为之者，通史断代之体裁云云，马班殊无意屑屑于此也。”^③魏氏指出两大史家本无意于此，与吕思勉所谓“史之断代，乃成事之偶然”，及姚光所称班史“断代而仍寓通史之法”，正是不谋而合，均为真知灼见。事实上，既然《史记》这部通史已经产生，《汉书》重复它的全部内容，也就有所不必，而当时班固所面对的客观形势，第一，是大一统政权已经确立、稳定；第二，~~是~~王莽伏诛，光武复汉，正好为《汉书》提供了一个下限。因此，《汉书》之断限，实在可说是形势有以助成。然而班固初无明确之“断代史”观念，《史记》所未详之处，班固亦多所补充。《古今人表》固为显例，而十志中记古代典章制度，亦多上溯异代，通乎古今，非独叙汉而已。论者有以为《汉书》作

者纯粹是希望续补《史记》，非有意断代为书，亦未免忽视了《汉书》的独立价值。张孟伦指出《汉书》之体裁，“就它的纪、传而言，是以西汉人物为限的断代史，就它的十志来说，是贯通古今典章制度和经济、文化的通史”^①，则允为折衷之说，也恰当地显现了《汉书》的“通史性格”。明乎此，则更可知后世单纯从断限方面去褒贬《史》、《汉》之片面性。按郑樵曾猛烈抨击班固失乎会通之旨，“断汉为书，是致周秦不相因，古今成间隔”，而“自班固以断代为史，无复相因之义”^②。后人更声称《汉书》以一姓一朝为中枢，沦为“帝王家谱”，后代正史便纷纷效尤，而班固更被指有意识地进行此举。不过，历代正史是否真为“帝王家谱”，只是见仁见智，而《汉书》作者既无明确之断限观念，又怎能把他看成是变史为“帝王家谱”的罪魁祸首呢？

二

在讨论《古今人表》名概古今而不表“今人”时，部分学人尝探究过背后的原因而不遽以评作者自乱其例。颜师古注：“但次古人而不表今人者，其书未毕故也。”认为该表未毕，是颇为普遍的说法，也有人据班昭续书之说而谓该表非班固所作，更有谓此表可能是班固所欲独立成书而未毕，班昭乃“取以掺入《汉书》中，强符八《表》之数，而不计其于史裁不合”，^③殊属臆测。此外，章学诚认为该表“疑出汉世《春秋》经师相为授受”、“必有所受者”^④。这个说法，有人斥其“出于臆想”，也有人指称“极有可能”。又或认为是“续《史记》者所撰，后人编入《汉书》，初非孟坚之自乱其例”^⑤。另方面，也有人替作者辩护，指出今本《人表》，“传刻脱误，不知凡几”，而或经后世窜改，致次第紊乱，未可据以评品作者之是非观念。笔者认为，《人表》究出谁人之手，并不是最重要的，应该注意的，倒

是作者把它列入《汉书》一举在汉代史学史上的意义。这说明当时“断代为史”的观念甚为模糊，而“通古今之变”仍是主导之史学思想。随着大一统政权之确立和儒家思想之巩固，班固抱有“尊汉”意识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。他很明确地表达了对将汉朝帝业“编于百王之末，厕于秦、项之列”的不满，而当世史家也“罕能精古今之清浊，究汉德之所由”^⑤；又认为“大汉当可独立一史”^⑦。但为什么《古今人表》偏偏只列古人呢？也正好于此了解一个侧面。

诚然，《古今人表》并非完全没有汉人，但只不过是限于秦、汉之际的历史人物而已。后人颇有认为作者的苦衷，在于明哲保身。因为当时的形势不许可他品评当朝帝王将相，否则可能危及性命，所以只好将他“不敢公之于世而又不甘沉默的帝王观”寄诸言外。对于颜注谓《人表》未毕的说法，后人颇多非议，以为未得作者微旨。他们认为，表名古今，正是“因古以知今”、“次古人即以表今人”、“表古人以为今人之鉴”、“等次古人，而今人在其中”、“若表今人，则高祖诸帝悉在优劣之中，岂孟坚所敢出”、“上古之世，圣帝明王，接踵而生，故圣人仁人智人居多，中古之世，则渐生中下之人……若必欲以有汉一代之人，尽列表中，试问将高祖以下诸帝，置于圣人之列耶？仁人之列耶？抑孟坚是汉人，能雌黄本朝人物耶？”此外，论者复指出，既然史谓班昭续成《汉书》，就不可能尚留遗漏，所以不能说该表未毕，而尚以“古今”名表，一方面是别有寄意，另方面是因为“去今字则无以为《汉书》”的道理。其实，如能设身处地，了解班固的时代，以及他当初因“私改国史”之诬而下狱，后来又奉诏而成国史的处境，当更能体会《古今人表》不表“今人”之用意。

总言之，班固所谓断汉为书，政治上的动机恐怕要比史学上之思量来得更为重要。他所基本考虑的，并不在史体之创新上，

只是配合了客观因素，《汉书》才成为中国断代史之始祖。惟其如此，我们方能了解他为什么没有严格地但录汉事，而处处有所突破。

三

关于《古今人表》本身的价值，也是值得注意的。表之为体，“旁行斜上”，眉目清楚，史迁开创于前而班固继起于后。虽然班固准备以记汉事为主，但他也继承了《史记》十表“通古今之变”的精神，而《人表》之创设，“上记古人”、“追溯前代”以“明统绪”，在专述汉代历史之同时亦对远古历史作了“走马灯式的回顾”，实在不能轻率地认为是多此一举。再者，一些影响较小、地位较低的历史人物的名字也藉着《人表》而保留至今，不致湮没。所以《人表》“以云稽古，亦非无功”。此外，如果“需要阐述某些史事的渊源，或因需要补充前史之所缺”，史书便往往“在局部上要突破全书的总的断限”，兼且时代相近的人物，每难轩輊，有待盖棺论定，“故断代为史必续前代人表，乃可以承其绪；而当代人表必俟论定之后再加编辑，以为后史之统”。章学诚对于《人表》之功效，颇申其详，虽然关于通史和断代史应否录有人表这个问题，他的意见表现得前后矛盾，然而对于《人表》作用的想法，却始终如一，他认为：“列传裁断所余，不以人表收其梗概，则略者致讥挂漏，详者被谤偏徇。”^⑧又强调说：“夫不立人表，则列传不得不多，年表犹其次焉者耳，而人表方为史家怪笑，不敢复犯……专门名家之史，非人表不足以明其独断别裁；集众所长之史，非人表不足以杜其参差同异；强分抑配之史，非人表不足以制其芜滥猥赘。故曰断代之史，约计三门，皆不可无人表也”^⑨。实斋于人表效用，阐释最详，认为它不失为处理不同详略的经济史体，亦可谓持平之论。

再者，《人表》之创制，除了对传统历史编纂学有所贡献外，亦

颇能反映出东汉时期品评历史人物的标准，以及对魏晋九品论人风气之影响，是研究汉晋思想史不可忽略的材料。钱大昕“独爱其表章正学，有功名教。识见迥非寻常所能及”^②，但这种意义在今天亦已转化为对研究史学史和思想史的助益了。

1986年11月5日于香港大学柏立基学院

注：

①详陆奎勋：《陆堂诗续集》卷3，页7上。

②刘知几撰，浦起龙释《史通通释》，卷1，《六家》第1，页22。

③同上，卷4，《题目》第11，页92。④同上，卷3，《表历》第7，页54。

⑤同上，卷4，《断限》第12，页95—96。

⑥见王先谦：《汉书补注》卷100，《叙传》第70下，页1739。

⑦见赖明德：《司马迁与班固史学之比较》，《中国学术年刊》，4期（1982年6月），页52—53。

⑧见刘节：《中国史学史稿》，页66。有关通史和断代史之相辅相成，又参许凌云：《论“通史家风”》，《历史研究》，1983年4期（1983年8月），页72—84。

⑨司马迁：《史记》卷130，《太史公自序》第70，页3300、3321。

⑩参看魏应麒《中国史学史》，页96。

⑪参张孟伦：《中国史学史》，页153。

⑫见郑樵《通志·总叙》页2、3、4。

⑬班昭续八表及《天文志》说，可参《后汉书》（中华书局版）卷84，《列女传》第74，《曹世叔妻传》，页2784~2785。

⑭参《章学诚遗书》卷24，页247。⑮参吕思勉《史通评》页107。

⑯参《汉书·叙传》，《后汉书》卷40下，页1369。

⑰《初学记》卷21，页503。⑱⑲参《章学诚遗书》，卷15，页135、136。

⑳见钱大昕《跋汉书古今人表》，《潜研堂文集》卷28，页2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香港大学中文系